

王安石政治哲学中的儒学理路

师亚笑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淮安 223005)

[摘要]王安石改革包括教育、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其改革措施来看,改革始终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导。王安石继承儒家“王道”观念,认为要“法先王之意”,在不离“仁政”的基础上,政策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教化方面,他主张礼乐、刑政并用,以礼乐为主、刑政为辅,已然突破了传统的儒家教化观。面对儒学经世致用的衰落,他主持编撰《三经新义》,将其作为教育读本,为改革寻找理论依据。通过研究王安石政治哲学中的儒学思想,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改革内容、理清思想脉络,且其中重视人才和法律的思想对当下的改革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王安石;王道;教化;经世致用

[作者简介]师亚笑(1996—),女,山西临汾人,江苏护理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儒家文化。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10025>

[中图分类号] B244.5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生活在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一生两次出任宰相,两次罢相,以主持熙宁变法闻名于世。嘉祐三年,王安石返京述职,在写给仁宗皇帝的《上皇帝万言书》中极陈改革之事,为之后的熙宁变法描绘了宏伟蓝图,但并未得到重用。宋神宗继位后,提拔王安石,进行变法。自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王安石在教育、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王安石所实行的改革中,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其中占着主导地位,极大地支撑了王安石变法的实行。

一、王道观念:从“法先王之迹”到“法先王之意”

儒家传统的“先王”理念,在经典中皆有迹可循,孔子和孟子都是“先王之道”的追求者,《论语》中有“先王之道,斯为美”的记载,孟子曾提出“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先王”理念经过千百年的传承,至宋代已经成为士人的普遍观念,北宋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也提出了“委先王之典”“先王修德以服远人”等等关于“先王”的理念。在王安石所留下的著作中,“先王”更是被多次提起,如“先王之意”“先王之迹”“先王之法”“二帝、三王”等等。可见宋代士人对于“王道”的追求从未中断。

自儒学成为官方学说以来,“二帝三王”“七制之主”成为儒者和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精神榜样。嘉祐三年,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任满返京述职时,在写给仁宗皇帝的《上皇帝万言书》的开篇写道:“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王安石上书言明天下不安,在于不知法度,又引孟子“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仁心仁闻加以百姓则为先王之道,体现出他对王道的重视。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

王安石在上书中提到政治得失,不在于“法先王之迹”而在于“法先王之意”,他认识到由于时代变化所造成的局势不一,不应照搬前代制度,而要因时而变。“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虽然各个时代局势不同,但施政的方针始终不离其宗旨,就是“仁政”,只有实行仁政,实现“王道政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可见,王安石认为“仁政”是国家安稳的基础,而“变通”则是政策实行的前提。从具体的变法措施来看,王安石始终以复兴王道为政治目标,以“法先王之意”为政治指导方针。

王安石“法先王”的理念直接承袭于孟子,却又与孟子有所不同。孟子同样效法尧舜,但是其重心在于“仁政”“德治”。而纵观王安石的理念,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虽然认为要“法先王”,但是他注重的是“先王之意”,有着变通的思想,同时在实际的改革中分外强调“礼法”的作用,这与荀子“隆礼重法”的观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二、教化观念:从“礼乐教化”到“礼法并用”

礼乐观念在我国由来已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近代王国维先生又根据甲骨文中的“礼”字的字形进行考证,得出了“礼”为祭神之器,被用来概括祭祀活动,可见与上古时期的祭祀活动有关。自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观念广泛进入人们的视野。孔子也十分重视“礼乐”的重要性,在《论语》有多处论述“礼乐”的语句,从个人出发,有“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国家角度出发,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等。《礼记·乐记》中则写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可见礼乐不仅有利于个人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而且也有利于良好国家秩序的建立,有利于国家稳定。

王安石同样也认识到了礼乐教化的重要功能,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王安石注解到“定上下然后辨内外,辨内外然后明尊卑,礼之序也”,在王安石看来礼的本质就是规范社会等级秩序。此外又提到“外作器,以通神明之德;内作德,以正性命之情”,可见,礼不仅规范着社会秩序,也表现着人们的道德品质。尽管王安石十分推崇“礼”,但他也认识到单靠礼乐治国是行不通的,单以儒家思想推动改革是不现实的,所以他吸取其他学派的思想,使之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尤以法家思想为甚。王安石极为推崇商鞅,认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肯定了商鞅的变法。王安石也因为其思想中的法家思想而受到后世儒家的批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儒法结合从董仲舒时就有明显的趋势,先秦儒家学者也曾肯定法的作用,儒法结

合是历史的必然。其三不欺云“昔论者曰:君任德,则下不忍欺,君任察,则下不能欺,君任刑,则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为次。盖未之尽也。”

王安石对于法的重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改革中的重要措施都是通过法令的形式颁布的。如青苗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与范仲淹所实行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等改革措施相比,其形式上是强硬的。同时,王安石也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熙宁四年“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按,所以待诸科之不能业进士者。未几,选人、任子,亦试律令始出官。又诏进士自第三人以下试法。”明确了律学的考试程序和内容。此外,王安石认为“昔试刑法者,世皆指为俗吏,今朝廷推恩既厚,而应者尚少,若高科不试,则人不以为荣。”通过设置专门的科目提高刑法者的地位,促进法律的专业化,不仅推进了改革,也使得法律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重视法律的社会风气。

“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王安石在《周公》一文中多次提到“善法”,“善法”指王道仁政,但是王安石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中却融入了法家“刑政”的内容,以此作为改革的助力。

“或曰教化,或曰政教,或曰刑政,何也?教化,本也;刑政,末也。至于王道衰,则其本先亡矣,故不足于教化而后言政教,不足于政教而后言刑政。”

可以看出,王安石不同于法家的最大之处,就在于处理礼乐和刑政的关系。王安石视礼乐教化为本、视刑政为末,而法家则将刑政运用于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王安石同传统儒家士人一样,认为以礼乐教化治国能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长久之计,而以刑政治国只能起到一时作用。所以,王安石极力提倡礼乐教化。

“礼典礼职,皆以和邦国,以谐万民,盖礼者,体也;体足矣,则礼典之为书,与礼官之为职,不能有加损也。刑典刑职,皆以诘邦国,以纠万民,其意亦犹是也。盖刑者,形也,形成矣;则刑典之为书,刑官之为职,亦不能有加损也。……治典教典曰官府,礼典政典刑典事典曰百官者,官府言其属,百官则言六官之属。”

王安石将治理国家分为“治、教、礼、政、刑”五个层次,且各有所属,各司其职。在其中王安石又指出“礼”为“体”,“刑”为“形”,二者互为表里。可

以看出,王安石的教化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儒家,他跳出了儒法之间的藩篱,将儒、法治国观念进行了整合,以达到礼法并用的目的。

三、经世致用:从“章句训诂”到“经世致用”

北宋朝廷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分化官职,增设机构;军事上,实行“军无常帅,帅无常军”的政策;经济上,土地不抑兼并。长期如此,使得社会矛盾尖锐,北宋朝廷也出现了冗兵、冗官、冗费的现象。西夏和契丹的屡次侵犯,使得北宋朝廷陷于内交外困。北宋士大夫面对如此局面,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如何改变当前境况,成为士人思考的主要问题。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潮也代替了佛老的空虚进入士人的视野。北宋学者沉迷于章句训诂之学的风气也在此时发生了转变。

“经世致用”是王安石的主要思想,他的改革也都是以“经世致用”为理论基础进行的。究其原因,除北宋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影响之外,王安石个人对于“王道”政治的追求也是他主张“经世”的重要因素。在《上皇帝万言书》中,王安石多次提及“二帝三王”“先王之政”“尧舜”等。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载,宋神宗与王安石讨论治国之道,问当今治国要以何为先,王安石回答说要以尧舜为法,认为“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王安石指出了当时教育制度的弊端,认为章句训诂之学使得士子思维固化,不显儒学经世之用,致使在政治上茫然无措,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所以极力主张恢复儒学经世的功能。《上皇帝万言书》中王安石在论证当今非王道政治的原因时提到“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为改变此局面,王安石将改革科举制作为其教育改革的切入点。新政废除了明经科,进士科考试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且增加了法科,改变了以往注重章句训诂之学的弊端,

对于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有一定作用。王安石也对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进行了改革。在教育方式上,王安石针对太学,实行了“三舍法”,将太学学生分为“内舍生、外舍生、上舍生”,并且实行考核制度,“上舍生”中位列上等的,可以不经科举考试,直接授予官职。此外还设立了武学、律学、医学等,促使教育显现其经世之用。在教育内容方面,为减轻改革的压力,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同其子王雱、弟子吕惠卿共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行于学官成为官方教材,士子的必读之书。

在经济方面,从熙宁二年至元丰八年,相继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免役法等,目的在于促进生产、增加赋税。以青苗法为例,新政规定各地政府在夏粮、秋粮未成熟之前,可借贷给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由于粮价的高低、产量的变化给农民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可抑制民间高利贷对农民生产产生的影响。针对当时农民困于租税之中,而富商大贾大肆谋利的情况,政府在东南地区设置发运使,掌握当地货物供需情况,以达到“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目的,加强国家对于商品流通的管控,是为“均输法”。而方田均税法更是通过丈量土地、确定税额的方式,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这些措施都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而为减轻改革的阻力,王安石多次从经典中为改革寻找理论依据。如司马光认为“青苗法”“免役法”不符合民众的实际需求,对此多加批评,甚至二人之间有书信的交锋。面对批评和指责,王安石多次引用《尚书》中盘庚迁都的事迹来说服神宗:“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王安石认为盘庚在迁都时也面临着民众的不解,与当下的情况是一样的,他希望神宗能够效仿盘庚坚定改革的决心。

《周礼·旅师》中记载:“旅师,掌聚野之锄粟、屋粟、闲粟而用之,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基于此,在《周官新义》中,王安石明确解释了“青苗法”,“掌具之锄粟、屋粟、闲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颁以施以散也。施其惠,若民有艰阨,不责其偿”。关于方田均税法,《周官新义》中王安石有“听师田以简稽者,简谓阅而选之,稽谓考而计,简稽则皆有书焉。听师田者,欲知其车徒之所任,财器之所出而已,故以简稽听之也”的论述。其他方法,如市易法、免役法在

《上五事书》中就已言明,“市易之法起于周之市司,汉之平准”“盖免役之法,出于周官所谓府、史、胥、徒,王制所谓庶人在官者也”。

“以稽其功绪、纠其德行为先,则不可致察,凡其出入,则所以致察也……若行事可会矣,然后邦有大事,可责以政令而守也;于是无事矣,思患预防而已。”

可见,保甲法、保马法在其中均有出处。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三经新义》可以说是改革的蓝本,也是改革各项措施的理论来源。王安石将经学与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为了促进改革,更是他作为一名儒者经世致用的自觉,也是他追求“法先王之意”的体现。

四、对当今改革的启示

熙宁变法是王安石政治生涯的中心,是以王安石为主导,旨在实现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从改革的措施来看,失败似乎早有预兆。《宋史》载:“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监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洺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将新法推行至全国,这些新法有的曾在小范围内试点,有的则没有进行尝试,是不成熟的产物。改革派人物也曾意识到改革过于激进,刘挚言“昨者团结保甲,民方惊扰,又作法使人均出缗钱,非时升降户等,期会急迫,人情惶骇”。多项改革措施的实行不仅没有给当地政府以适应时间,更重要的是小农经济下的民众,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弱,最终导致“天下骚然矣”。在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是礼法并用治国观念的提出以及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但是这并没有触及到政治改革的内部,并未给经济、军事改革形成强大的助力,其结果只会是事倍功半。所以说对于政治改革的回避也是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也留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我们更应该重视公职人员的自身素养和道德品质,提升公职人员的个人能力,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敢为人先”的精神,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助推力量。其次,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王安石对于改革态度始终是坚决的、强硬的,对于朝野众人的反对声充耳不闻,其支持者刘挚,也因为提出新法推行过快而遭贬官。“开封民避保甲,有截

指断腕者”“泉币绝乏,货法不通,商旅农夫,最受其弊”等情况的出现也没有停下改革的脚步。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必须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倾听人民的声音,将人民群众的要求落到实处,更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变通,不做纸上书生,做实事求是的改革者。最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孔子常言“为政以德”,道德在感化人心,建立社会秩序、美序良俗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法律的重要性。王安石在上书中提及天下久不安的原因在于“不知法度”,可见法律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法律愈显重要。法律的强硬性可以有效避免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当今我国处在飞速变革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涌现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法律的执行方面,要真正地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通过令行禁止提高政策的执行力度,促使政策落实,推动改革的不断深化;在法律的完善方面,要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使民众知法、守法、懂法、用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促进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王安石一直致力于恢复“王道”政治,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要“法先王之意”,所实行的政策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变化。面对质疑,王安石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希望借助经典能够坚定帝王改革的决心,同时主持编撰《三经新义》,扩大改革的影响力,力图为改革扫清障碍。改革的失败不仅是守旧派与革新派之间矛盾的后果,更是王安石理想政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致。后人对于王安石及其改革的评价亦褒亦贬,王安石也因为变法成为颇有争议的人物。尽管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王安石对于“王道”政治的追求,恢复儒学经世致用的努力在今天来看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41,91.
- [2]杨伯峻,杨逢彬.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19:139-140.
- [3]周鸿度,等.范仲淹史料新编[M].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71.
-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清)黄以周,等,

辑补.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宋)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1-2,6,19,305,777.

[6](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M]. (宋)徐铉,校定. 北京:中华书局,2013:1.

[7](西汉)戴圣. 礼记[M]. 张博,编译.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9:249-253.

[8]程元敏. 三经新义辑考汇评: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8-19,59,78-79,251,277,290.

[9]宋史(第 155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618.

[10]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99.

[11]程元敏. 王安石全集·尚书新义·诗经新义[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351.

[12]姜广辉. 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55.

[13](清)黄以周,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4]宋史(第 327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0545-10546.

[15]宋史(第 177 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7:4302,4309.

[16]代天喜. 论朱熹民本思想对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实践启示[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5,38(8):138-140.

Confuciansim of Wang Anshi's Politics Philosophy

SHI Ya-xiao

(School of Marxism, Jiangsu College of Nursing, Huai'an Jiangsu 223005, China)

Abstract: Wang Anshi's reforms encompass education, economy, military affairs, and other domains. Judging from his reform measures, Confucian political thought consistently guide the reforms. Wang Anshi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the "kingly way", advocating "follow the intent of the ancient kings". While remaining grounded in benevolent governance, he believed policies should adapt to changing times. In terms of moral education, he proposed combining ritual and music, as well as legal, with ritual and music as the main means and punishment as supplementary ones—had already broke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Facing the decline of statecraft for practical use, he compiled th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hree Classics, and used them as materials for education, seek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form.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Confucian thought in Wang Ans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e can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form's content and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is thought. Moreover, the ideas that emphasize talents and the rule of law still hold certain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rrent reform.

Key words: Wang Anshi; kingly way; moral education; statecraft for practical use